

文明镜像与他者想象——《耶稣会士中国书简》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马英杰 张若强*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耶稣会士中国书简》作为 18 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书信的系统汇编, 是西方汉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原典文献之一。书简对中国形象的构建涉及帝王政治秩序的理想化建构、儒教礼仪文明的异质性呈现, 以及科学知识交流中的中国镜像三个维度。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象并非单纯的客观记录, 而是经过传教目的、文化预设与启蒙思潮多重过滤后的想象性建构; 这一建构在强化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携带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

关键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 中国形象; 耶稣会纪

Reflection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n "The Jesuit Letters from China"

Ma Yingjie, Zhang Ruoqia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000

Abstract: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a systematic compilation of letters written by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rimary sourc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n these letters encompasses three dimensions: the idealized portrayal of the imperial political order, the heterogeneous presentation of Confucian 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f China in the exchang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image of China portrayed by the Jesuits is not a mere objective record, but rather an imaginative construction filtered through missionary objectives, cultural presuppositions, and Enlightenment thought; while this construction strengthens the dialogu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t inevitably carries the cognitive limitations of Western-centric perspectives.

Keywords: "Letters of the Jesuits from China"; The image of China; Jesuit chronicles

0 引言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以下简称《书简》)自 1702 年由耶稣会士郭弼恩(Le Gobien)神父在巴黎首次出版,至 1776 年最终成集,历时七十余年,凡三十四卷,汇集了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数代人的书信报告,是 18 世纪欧洲认识中国的最重要窗口之一。这批文献既是宗教传播的工具,也是文化交流的媒介,深刻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认知与想象。耶稣会士通过《书简》在帝王政治、礼仪文明与科学交流三个向度上,建构起一幅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图景,其中既包含了传教士们的真实见闻与深切感受,也渗透着他们的传教目的、时代偏见与文化想象。

1 帝王与朝廷: 政治权威的理想化书写

在《书简》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体系中,帝王形象占据着核心位置,构成了整个中国叙事的关键坐标。耶稣会士

以“clémentine”(仁慈)、“tolérance”(宽容)、“infatigable dans le travail”(勤于政务)等词汇刻画中国皇帝,这些词汇并非中立的政治描述,而是他们在传教策略与启蒙语境双重驱动下的话语选择。康熙皇帝的形象在《书简》中被提升至接近圣王的高度,并通过书信这一兼具私密与公开性质的文体形式传递至欧洲读者的想象世界之中。《书简》年表中引用狄德罗的评语,称康熙是“以睿智堪比马可·奥勒留(Marc Auréle)、以专制之威与统治之长堪比路易十四的帝王”^[1],这一来自启蒙哲学代表人物的高度评价,清楚表明耶稣会士对康熙的建构已深度嵌入 18 世纪欧洲的开明专制话语之中。

文本中有关康熙 1692 年宽容敕令的记载尤为典型。《书简》引述这份敕令的内容如下:“在朝的欧洲人长期主持数学事务,在内乱之时借助铸炮之技给予了朕至关重要的协助;他们的审慎与非凡才干,加之热忱与不懈努力,

迫使朕不得不重视他们。此外，他们的律法并不煽动叛乱，不引导人民反抗。因此朕认为应当允许之，以便所有愿意信奉者能自由进入教堂，公开举行礼拜活动。”^[1]康熙的宽容绝非出于宗教信仰的认同，而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政治考量之上。耶稣会士的科学才能与政治忠诚，是换取帝国庇护的实质筹码。然而耶稣会士们在转述这份敕令时，刻意突出其宽容精神的一面，并将之与同时期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迫害胡格诺教徒的举措加以隐性对比。这一对比正是伏尔泰等哲学家借中国之镜反观欧洲弊政的思想操作在文本层面的直接来源。换言之，《书简》中的康熙形象，并非中立的历史记录，而是一个经过精心剪裁以服务特定论述需要的文化符号。

《书简》对官僚体制与科举制度的书写，同样呈现出高度理想化的特征。传教士们将科举制度描述为一种以才学取士、不问出身门第的公正选拔机制，并明确揭示其与欧洲世袭贵族制度的根本差异。《书简》编者在引言中引述艾田蒲（Etiemble）的研究，明确指出耶稣会士带回欧洲的中国经验中，科举考试制度对后来英国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的影响尤为深远。《书简》对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想象或宗教修辞，它同时也是欧洲社会推进自我改革时援引的概念资源。《书简》中的理想化中国朝廷，既是一面折射自身文化焦虑的历史之镜，也是推动欧洲思想变革的精神催化剂。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官僚体制，以其理性化、制度化的面貌回应了欧洲启蒙时代对于良治政府的终极追问，而这一回应的有效性，恰恰依赖于文本中精心营造的中国政治形象的可信度与感召力。

2 礼仪与宗教：文明中国的异质性呈现

《书简》中涉及中国礼仪习俗的篇幅极为丰富。从祭祖仪式、祭孔典礼，到民间信仰、佛道两教，传教士们都留下了大量细致入微的田野观察记录。然而，这些看似客观的描述，始终无法摆脱“礼仪之争”（Querelle des rites）这一神学与政治双重阴影。在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旷日持久的论争中，中国礼仪究竟是“世俗典礼”还是“偶像崇拜”这一核心问题，决定了传教策略的根本走向，也决定了《书简》作者们观察与描述中国礼仪时所预设的立场与解释框架。正是这一框架，使得《书简》中的中国宗教与礼仪形象，从一开始便不可能是单纯的文化记录，而必然是一种充满论战意味的话语建构。

《书简》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是骆保禄（Gozani）神父关于河南开封犹太群体的调查书信。他在信中详细记录了这一群体参与儒家礼仪的具体情形。他们的文人在孔

庙中与其他儒生一同举行典礼以获取学位，春秋两季在宗祠内按照中国习俗祭祀祖先，虽不用猪肉，但以其他牲畜及瓷器盛装的餐食和糕点进行祭祀，并伴以燃香与深深的叩首礼；他们虽不使用牌位（因其律法禁止崇拜偶像或类似之物），但仍设置香炉，惟有其中的达官显贵方在宗祠内立有标记姓名与官衔的木牌。

这种描述并不能掩盖传教士们在面对中国宗教文化时所体验到的真实困惑。儒学究竟是一种哲学伦理体系，还是一种宗教信仰形态？这始终是《书简》文本内部的一个未解问题。一方面，耶稣会士们热情赞扬儒家的政治伦理，将仁、义、礼等核心价值与基督教道德神学相比，为儒学赋予了接近自然神学的哲学地位。孔子在《书简》中被反复提及，被视为一位道德立法者与社会秩序的奠基人，其形象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或古罗马的马可·奥勒留相互辉映，构成了一种超越文化边界的普世理性符号。另一方面，传教士们在具体礼俗层面又不得不承认儒家礼仪的宗教性特征，焚香、叩首、祭品等行为在视觉上与宗教崇拜毫无二致，使得“世俗礼仪”的论断面临持续的质疑压力。这也是《书简》中中国礼仪文明形象的基本叙述困境，也是后来1704年克雷芒十一世颁布敕令、1742年本笃十四世颁布《自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宗座令彻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奉行中国礼仪的神学根源之所在。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礼仪之争”的失败不仅导致在华传教事业遭受重创，也意味着《书简》所代表的那种对中国文明进行同情性、调适性建构的文化策略，最终被一种更为对抗性的文明等级话语所取代。

《书简》中中国宗教形象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教士们对“他者”的认知模式本身。他们携带着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概念体系进入中国，以这一体系为坐标来衡量、分类与评价所观察到的一切文化现象。《书简》附注中对汉语“天”字的详细辨析，正是这种认知模式的典型体现。耶稣会士相信，在各文明的表层差异之下，存在着关于最高存在的共同直觉，而传教的使命正是发掘并唤醒这一共同底蕴。这种普世主义视角固然赋予了他们对中国文明前所未有的理解与同情，却同时也将中国宗教文化纳入了一个以基督教神学为最终尺度的认知等级秩序之中。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其著作《中国与基督教》中说，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并非两种等值文明的对话，而是两套根本异质的概念体系的碰撞，双方的误解与错位远多于真正的相互理解^[2]。《书简》文本中既充满对中国文明的深切赞美，又隐含着对其最终“归化”于普世

真理之必要性的坚定信念,这种双重定位构成了《书简》中国形象最为深刻的内在悖论。

3 科学与交流:知识媒介视野中的中国镜像

在《书简》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中,科学知识的交流构成了一条贯穿始终的核心叙事线索。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宫廷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的科学才能之上。他们留存下来的书信,也因此大量涉及天文、历法、地图测绘、数学及自然知识等领域的内容。这种科学叙事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兼具赞叹与俯视的双重色调。中国的科学成就受到充分肯定,尤其是其历史积淀的深厚与技术经验的丰富;但在理论体系与系统方法论上,中国科学被隐性地置于欧洲近代科学的阴影之下,成为尚待西方知识启蒙的“沉睡的智慧宝库”。这种形象建构的逻辑,与18世纪欧洲启蒙话语对“进步”与“文明”的想象密切相关。

然而,深入细读《书简》的科学叙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权力不对等逻辑。耶稣会士们在描述知识交流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自身定位为知识的主动传播者,而将中国朝廷与中国学者塑造为渴望接受西方科学馈赠的被动接受方。康熙皇帝向耶稣会士学习数学与天文学的记述,固然体现了一代君主求知若渴的雅量,但在书信的叙事语境中,这一细节同时也强化了西方科学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认识论优越性。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创立,明确源于路易十四与科学院的政治授意,其目的在于打破葡萄牙人在华传教的垄断地位,同时为巴黎科学院获取中国的地理与自然知识,以服务于法国的地理测绘改革计划。洪若翰(P. de Fontaney)神父在1703年2月15日书信中,坦诚记述了这一使命的政治起源:科学院需要精通数学的人员前往印度和中国,而耶稣会士因其遍布各地的传教网络,成为最便利的科学情报收集者。这一政治背景的存在,使得《书简》中那些看似客观的科学观察记录,实际上深度嵌入了帝国主义知识生产与殖民地理学的权力结构之中。科学交流叙事因此构成了一种双重话语,表面上是文明互鉴的美好愿景,深层则是欧洲启蒙理性向外扩张的知识版图。

《书简》的科学叙事也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知识传统的珍贵记录,这些记录展现出传教士们对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真诚的好奇与敬重。殷弘绪神父关于景德镇瓷器制造工艺的调查书信,是《书简》中最著名的科技史文献之一;巴多明神父与马若瑟神父关于中医草药学与汉字语言学的研究,同样体现了耶稣会士在专业知识领域上的非凡造诣。这些文本所建构的中国知识形象,既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简单贬低,也有别于浪漫主义的盲目崇拜,而是

呈现出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复杂态度。传教士们一方面承认中国在陶瓷、农业、水利工程等应用技术领域积累了数千年的深厚经验,另一方面又坚信这些经验知识若能与欧洲的理性化方法论相结合,必能焕发出更大的文明效能。这种“知识补全”的逻辑,本质上仍是一种以欧洲近代科学为标准的文明等级观,只是以较为温和的文化调适姿态加以表达。

《书简》的知识传播功能,在18世纪欧洲思想史上产生了远超其传教使命的深远影响。其翔实丰富的内容,成为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哲学家论证中国文明价值的重要依据。其编者引用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中的颂词,称耶稣会士为“和平征服者”,他们携带望远镜与罗盘抵达中国,留下了文明的足迹。《书简》知识叙事背后潜藏的文明征服想象。科学文化传播看似温和,实则与军事征服共享扩张逻辑,只是以更优雅的方式完成对异域文明的排序与整合。

4 结语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中的中国形象既包含传教士们对这一古老文明的真实赞叹与深切理解,也渗透着宗教传播策略的有意塑造、启蒙话语的思想折射以及近代欧洲知识扩张的权力逻辑。圣君康熙的政治形象、儒家礼仪文明的宗教诠释、科学交流中的知识优越叙事共同构成了《书简》中国图像的核心结构,折射出18世纪欧洲文明自我认知的深层焦虑与想象边界。《书简》作为汉学史上的奠基性文献,其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见闻,更在于它以文字的方式开创了一套理解中国的诠释框架,这一框架深刻影响了此后西方中国观的基本走向。

参考文献:

- [1] Gernet, J.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action* [M]. Paris: Gallimard, 1982.
 - [2] Vissière, I., Vissière, J.-L. (é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par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1702-1776* [M].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 [3] 孙祥飞. 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5.
- 作者简介: 马英杰(2005.01-), 男, 汉族, 江苏盐城人, 本科在读, 专业方向: 法语。
- * 通讯作者: 张若强(1980.01-), 男, 汉族, 山东郓城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法国文学, 翻译, 区域国别。